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确立对美 政策方针的战略考量

宫力

[摘要]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在确定中国对美关系的大政方针,以及做出重要的外交决策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始终关注中美关系的微妙发展,并把中美关系看作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方面。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揭露美蒋和谈的图谋,同时为清除西方列强在华影响,采取不急于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建交的方针;同时,毛泽东也作了另一种准备,即也可以在具备条件时经过谈判,在平等的基础上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这说明毛泽东对美政策的态度是灵活的,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最终弄清了美国对华战略意图之后,毛泽东撰写了五篇文章评美国白皮书,通过对白皮书的讨论,中国人民作好了同美国的敌视、封锁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关键词] 毛泽东;中美关系;政策方针;战略;外交决策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4)10-0085-0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美苏冷战格局,美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试图称霸世界,并且支持国民党与中共打了三年内战,成为中国革命的巨大阻力。在这种背景下,对美国的方针和政策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进行战略思考的重点之一。进入1949年,“新中国的航船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如何处理同美国的关系已经成为新中国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毛泽东依据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细致观察,以及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陆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对美政策与方针,从而确立起新中国的对美外交战略和策略。

一、揭露美蒋和谈图谋, 防御美国出兵干涉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美国所支持的国民党政府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这种局面下,美国政府看出单用军事的手段已无法挽回败局,于是开始策划新的对华政策,以期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直至策动国民党政府打出“和谈”的旗帜,以期保存实力,争取喘息时间。

1949年1月,美国政府采纳了其国务院政策设计

司提出的《重审并制定对华政策》备忘录的建议:“(一)继续承认现存的国民政府;(二)在国民政府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消灭之后,根据当时情况再决定承认问题;(三)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当:(A)制定相应计划,并适时作好准备,以便在中国出现机会时,加以利用;同时保持灵活性,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身上。(B)在先后次序上,把中国排在另外一些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更加直接,与美国为之花费的财力更为相称。2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批准落实上述备忘录,并且明确指出应把“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胜”的政策改为“一切力量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1](p.322)}

毛泽东敏锐地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及时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2](p.1374)}

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二种方式更具欺骗性,在

中国国内还有一定的市场,毛泽东对此动向特别关注。为了揭露美蒋的和谈图谋,不使革命半途而废。他在为新华社所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毛泽东着重阐明的道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中国人民一定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历数了美蒋勾结发动内战的种种行为,指出:“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他还引用希腊寓言中农夫和蛇的故事,告诫中国人民决不能怜惜蛇一样的恶人。^{[2](pp.1374-1377)}

毛泽东的上述评论戳穿了美蒋的和谈图谋,使中国人民认清了蒋介石求和的真实目的,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

在揭露美蒋和谈图谋的同时,毛泽东亦提出要警惕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讲话说:“美国是不是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我们不乱搞,对侨民不损害他。党内有进步,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学会了政策和策略,一九四九年还要普遍地进行政策教育。”^{[3](p.945)}

在此基础上,1949年1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强调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不过,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减少。毛泽东特别指出:“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份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4](p.76)}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坚定信念,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最后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料的,由于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坚决斗争和国民党政权

的无可救药,美国终因慑于“中国人对侵犯主权之强烈及其浓厚民族主义思想”,担心出兵会对美国“引起极严重后果”,而未敢轻举妄动。

二、不急于取得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承认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开展,蒋介石兵败如山倒,美国也在调整其对中共的策略。1948年11月,沈阳解放,美国国务院指示美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华德,告知沈阳当局,他以领事身份留在该市仅为帮助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非表示承认中共政权。^{[5](p.826)}实际上,美国此时打算让其驻华使领馆人员以半合法的身份在中国继续赖下去,并伺机施加影响。

对此,中共中央于11月10日指示东北局,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20日,沈阳军管会没收了美国总领事馆的电台。尔后美总领事馆人员及家属被软禁。11月25日,东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电报中报告了在沈阳破获的重大美国间谍案的情况,该间谍组织与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有关。美方在多次设法与其驻沈阳总领事馆取得联系未果的情况下,于1949年5月底,宣布关闭其驻沈阳总领事馆。^[6]6月19日,中共方面公布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

这时,毛泽东已在通盘考虑新中国的对外方针。如何对待美国等西方列强的问题,已成为一个十分敏感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为了彻底清除美国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维护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毛泽东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他们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但政策不乱,侨民要保护。将来要通商,可以考虑,但亦不忙。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7](p.546)}

这是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作出的重大外交决策,其基本点在随后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得到全面的反映,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种不承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承认的方针和立场,毛泽东称之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毛泽东认为,由于旧中国是一个长期为帝国主义控

制、欺侮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随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垮台,帝国主义的控制权也将被打倒,但是“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在中国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势力和影响,也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和自行消失。这些问题如果不能给以正确的解决,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必然受到影响。因此,毛泽东提出:“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来解决。”^{[2]pp.1434-1435}

这是毛泽东为新中国设想的对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所持的总的立场。

此外,毛泽东还估计,帝国主义对自己在华利益的丧失决不会善罢干休,“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2]p.1435}

在决定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同时,毛泽东把寻求友谊的眼光投向了苏联和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同苏联关系的符合逻辑的发展,也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敌视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及美国的工人,吸引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也能胜利。”因此,毛泽东认为,“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7]p.548}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宣布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

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2]pp.1472-1473}

三、另一种准备:对美国的 试探作出反应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不急于取得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承认,主要是估计到美国等西方列强不会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新中国,而新中国也需要时间来清除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影响,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作了另一种准备,即如果美国等西方列强在其扶蒋反共政策破产后,能够改弦更张,也可以在具备条件时,同这些国家举行谈判,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所以毛泽东一直没有关闭对美谈判的大门。只要美国政府能够顺应潮流,放弃敌视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新中国仍将愿意同它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这时美国方面的一些微妙举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并照会各驻华使馆随迁。但美国只派参赞克拉克带少量人员随迁广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耐人寻味地留在了南京,而没有将使领馆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

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之子,1876年出生在中国杭州,曾在燕京大学担任校长长达27年,是有名的中国通,他的燕大学生中有不少在中共方面,例如黄华等人。因此,他留在南京绝非偶然。4月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告司徒雷登,在同中共方面进行接触时不要把话说绝,注意保密,以免走漏风声,引起国会反对派的反对。^{[1]p.323}在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在此前后,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曾多次写信给中共方面进行试探。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于1949年4月28日致电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同志,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4]p.83}

事隔两天,毛泽东又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明确提出了新中国的建交原则问题。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们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4]p.85}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份文件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交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既有严正的原则立场,又有灵活机动的务实态度。

为了争取最好的结果,中共方面在人事方面也作了精心的安排。1949年4月上旬,曾经就读于燕京大学的黄华随南下工作队来到南京,并被授权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南京解放以后,黄华出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不到两周便与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取得了联系。傅泾波也是燕京大学学生,而且是黄华的同班同学。5月6日,他主动打电话给黄华,并于5月7日与黄华会面,表示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与中共方面接触,并已获艾奇逊国务卿同意。他还说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时期,希望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他表示可以从中牵线安排黄华与司徒雷登见面。黄华回应说,美国援蒋打内战的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创痛极深,空言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中共南京市委立即将情况上报中共中央。

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中共南京市委的复电,指示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并提出了在会谈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二)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笔者)声明。(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须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它‘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四)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采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

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4](p.87-88)}

黄华接到指示后于1949年5月13日前往司徒雷登住处与其会面。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并说,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已建议将美国在上海的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的援助蒋介石的面粉、棉花等物资,待上海解放后统统移交中方,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黄华当即表示:关于中国政府的组成,我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不需要外人干涉。粮食、棉花等我不接受(因为我们即将解放上海,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美国有关方面。^{[8](p.81)}

这时,毛泽东对美国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派黄华去谈判;另一方面,为了防备美军干预中国革命,毛泽东于5月23日对进军部署作了新的调整。他在电报中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建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3](p.962-963)}

5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电报,再次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中国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在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种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9](p.510)}

为了实现中共的对美外交目标,黄华于6月6日和司徒雷登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举行第二次会谈,重点是美国和新中国的建交问题。

黄华指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要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司徒雷登说,美国使节留在南京,这就表明了对国民党的态度。如今国民党政府再由广州他迁,则可肯定申明美国代表不拟随往。但因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司徒雷登表示,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且这个政府也证明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关于美国援蒋问题,司徒雷登表示,现在所运来的,为国会去年通过而未运来的,所余无几,今后再无援助。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据个人看法,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打下广州后召开,联合政府将

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产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已表明,我们反对任何对蒋援助,并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故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无从谈起。最后司徒雷登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他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完善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贡献。如中美关系有第三者出来协助亦有好处。对此,黄华表示,无需第三者参加。司徒雷登又说,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司徒雷登还以“个人身份”希望今后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新政府。黄华当即反驳说,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问题纯系内政、不许外人干涉。^{[10](p.28-29)}

从黄华和司徒雷登的上述会谈来看,中共方面把停止援蒋和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作为同美国建立新关系的先决条件,既坚持了政治原则,又给美国留下一次机会。但美方的态度显得暧昧,既想保持接触,又不想在实质问题上迈出大的步伐,而且还想用经济援助为诱饵,借以影响中共的政策,这是中共方面所不能答应的。

1949年6月8日,事情又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告诉黄华,司徒雷登认为美国现在对新中国很难作正式表示,需回国后努力争取,但他需要知道中共中央更高层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因此,司徒雷登提出,希望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顺便看看燕大。美国大使要访问北平,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举措,黄华立即将司徒雷登的要求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经考虑认为,此事通过非官方联系为好,遂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但司徒雷登接到陆的信后,于6月27日派傅泾波再次会见黄华,希望黄华电告北平,说明司徒雷登以前曾希望来北平,现因返美行期迫近,如北平同意他去燕京,请早决定。为节约时间,希允许他乘留在南京的美机前往。黄华就此问题再次请示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复示黄华:准许司徒雷登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因为此两事均为司徒雷登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他如来京只能挂一卧车,派人护送,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如他借口不乘飞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因美国国会闭幕与否,不应予以重视,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11](p.325)}

1949年6月28日,黄华通知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

电,同意他去北平一行。司徒雷登表示,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他将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

司徒雷登在与黄华进行接触的同时,还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陈铭枢和民主人士罗隆基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他要罗隆基转告,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6月24日,陈铭枢给司徒雷登回信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11](p.326)}

1949年7月9日,陈铭枢返回南京与司徒雷登见面,并交给他一份谈话备忘录和两个附件。中共领导人在答复中重申了中美建交的先决条件,毛泽东特别要求司徒雷登读一读他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上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2](p.1466)}

但是,对于中共领导人同意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对中美建交所作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美国政府均未作出积极的反应。美国此时奉行的对华政策是要“等待尘埃落定”,在国民党残余政权残而未死之时,美国虽然想通过同中共的会谈,保留其在中国大陆的利益,但并不愿意同国民党政权一刀两断,尤其是不愿意立即承认新中国。因此,美国担心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和造成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错觉。

美国最高当局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从而关闭了中美谈判建交的大门。随后,傅泾波来告黄华,美国政府要司徒雷登速返华盛顿,二三个月后或以私人身份去北平。

中美南京会谈虽未成功,却也说明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对美政策方面的态度是灵活的,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最终弄清了美国对华战略意图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采取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对抗政策。

四、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

在中美南京会谈无果而终之后,司徒雷登于1949年8月2日,偕傅泾波一行8人,乘美国一架运输机,

按南京军管会指定的出境航线,离开南京飞冲绳岛返美。临行前,司徒雷登曾试探如何同中方保持联络,中方予以回绝。可悲的是,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中美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期间,司徒雷登又遭到监控和盘查。^{[8](p.85)}1962年,长期受到冷遇的司徒雷登悄然逝世。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抵达檀香山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时期》(简称《美中关系白皮书》),以及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这些文件恰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历史见证。

《美中关系白皮书》主旨是讨论“谁失去了中国”。杜鲁门、艾奇逊这一派美国政府的当权者为了开脱对华政策失败的责任,平息来自对手的猛烈抨击,不惜公布大量文件、档案,详细说明了美国1944年至1949年对华政策的来龙去脉和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

毛泽东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非常重视,认为这是一份绝好的反面教材,可以使那些对美国仍存幻想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猛醒,可以使人民大众更加认清美国对华侵略的真实面目。为此,毛泽东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2](p.1499)}

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新华社从8月12日到9月16日间连续发表了6篇评论,对《美中关系白皮书》予以揭露和驳斥。其中除了《无可奈何的自供状》之外,其余5篇都是毛泽东撰写的。毛泽东还写信给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说:“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3](p.975)}

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5篇评论中,毛泽东通过引证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中的原话,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局势的发展是美国政府曾经设法加以控制,但又未能控制得了的。

艾奇逊在他的信中曾无奈地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果超出了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4](p.100)}

不过,面对这种结果,美国并不甘心失败。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4](p.101)}

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愿望和企图不能不引起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警觉。为此,毛泽东历数了帝国主义自1840年以来,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种种事实及其手法,再三强调“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4](p.101)}因此,中国人民要丢掉幻想,准备同它们作长期的斗争。

毛泽东进而指出:“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制,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4](p.103)}

毛泽东的这5篇评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随之而来的关于《美中关系白皮书》的大讨论中,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高了觉悟。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时候,通过对白皮书的讨论,中国人民已经作好了同美国的敌视、封锁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参考文献】

- [1]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4]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 [5]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R]. Diplomatic Papers, 1948, Vol.7.
- [6]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J].历史研究, 1994, (5).
- [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8]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0]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云 尔

bottleneck restricting future development. How to use the Marxist stand, viewpoint and method to resolve these issues in front of us becomes an urgent and important issue. Thinking about resolving these issues, we need to grasp the following key points: the high-speed growth to moderate growth,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economy;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deepening economic reform, improv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Inheritance promote China, the US and Germany, nurturing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JIANG Qian)

Study of the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China “Problem”: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ual Wor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 In modern journey, appear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to a certain extent lost meaning, spiritual devaluation, the value of collapse, moral anomie, lack of ideals, nothingness invasion and many other issues. For how to rebuild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initially put forward some new exploration path: To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o rebuild the spiritual world; to grasp and integrated system into the inner spiritual structure; to rebuild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the spiritual life, initiative and overall unity; put “Road confident, confident theory, institutional confidence” into the spirit of the masses of daily life in a rational cognition and consciousness. (WANG Hai-bin)

Inner Connotations of “Issue Consciousness”: A history of Marxism is a constantl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hat is the total social issues, the history of thinking of how to solve the overall social problem. Foster awareness of the problem, which means that captures the essence and rules of development, reflect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body’s self-confidence and courage to play. Chinese Communists to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Marxism, never afraid of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ruggle,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reflects the courage to dare to pla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Communists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and the combat is also reflected in solving problems and upgrade (LI Shuang-tao)

Development and Inspiration of Sociological Case Studies: a Second Study into the Classical Surveys by Marx and Engels: Lifestyle as a scientific concept put forward by Marx and Engels began. Since the birth of the industrial society, the issue of life, lifestyle, liv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times and so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sociology, which evolves out of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the “questionnaire” and other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Marx and Engels not only the first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lifestyle, and conducted the world’s first lifestyl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including the design of the first living conditions survey. By examining the details of their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ts significance can sort out the lifestyle and lifestyle questionnaire Evolution in China and gain the inspiration, and then sociological surve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ertain phenomena of reflection. (MA Hui-di Liu Er)

The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Important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first revolution of science provided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second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irmed the advance and validity of it.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s the scientific application and natural extens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unity between the first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productive practice at that time led to the first revolution of technology. The first r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provided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second r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it and made the scientific social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The third r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has both tested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present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t. (Cheng Su-mei)

The Regularity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Transmission of Marxist Works—Taking the *Anti-Duhring* and *On Contradiction* as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basic theory and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s, we have made a textual and contextual analysis of the Marxist classics, the “*Anti-Duhring*” and “*On Contradiction*.” It has made a specific elab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d frequency, wording and statements, semiotics, language features and the framework, from which it acquired the knowledge that the Marxist works followed a basic law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thus placed a textual foundation for their rapid transmission and spread later. It not only enlightened us to re-understand the realistic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wo classical works but also provided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 academic transmission. (MENG Sheng-jun LI Ming-de ZHENG Dong-fang)

China has Torn apart the Historical Curse of Hegemony by a Rising Power: With the grow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China has become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pivotal country, China’s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attention.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peatedly solemnly declared that China will unswervingly adhere to the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will rise to the unwavering will of the state, breaking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country is bound to tyrants,” the curse. Socialist China to break “a strong power is bound to seek hegemony,” the curse, has a history of logical necessity.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al character trend of the times,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 of the development aspiration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of justice and peace advocate peace-loving nation’s blood gene, is China to break the “a strong power is bound to seek hegemony” curse of logic elements. (JIN Zhao-hui)

Mao Zedong’s Strategic Contemplations regarding US Policy in New China: Due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Mao Zedong had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determining major policies for China-US relations, as well as other important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He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subtle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and the Sino-US relations 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new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At the crucial moment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ao Zedong timely attempt to expose Chiang peace talks, as well as clea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powers in China, taking in no hurry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Mao Zedong also made another preparation. You can also go through when you have the conditions to negoti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on an equal basis, which explains the attitude of the US policy of Mao Zedong is flexible and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objective circumstances and changing. After finally clarify the intent of the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 Mao Zedong wrote five articles published White Paper on 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White Paper, the Chinese people make the hostilit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embargo be mentally prepared for a long struggle. (GONG Li)